

## 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评析<sup>\*</sup>

姚大志/文

**提 要:** 在当代政治哲学中,女权主义占有特殊的地位。虽然女权主义按其思想渊源来看派别众多,但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派,即自由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和激进主义的。激进女权主义的思想与其他两个派别不同,其核心是对父权制的批判。这种女权主义在三个层面上展开了对父权制的批判:首先是对母性的分析,以破除父权制所制造的关于母性的神话;其次是性别批判,以揭示男女之分的社会构造和文化构造;最后是女性的解放,即探讨如何把女人从父权制中解放出来。

**关键词:** 女权主义; 激进主义; 父权制; 政治哲学

**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女权主义运动风起云涌,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当代社会对待女性的态度。从思想渊源来看,女权主义可以被分为各种不同的派别,如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分析的、激进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存在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生态学的等等,但是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派,它们是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和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

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关心的是人类普遍的自由、平等和正义,在这种意义上,它没有提出独特的女权主义问题。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试图用马克思主义来解释女性所受到的压迫并提出妇女解放的战略,但是它通常摇摆于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因此很难说是一种独立的女权主义。在这种意义上,只有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才是一种思想完全独立的派别。

激进女权主义的核心观念是:对女性的压迫来自于父权制,从而父权制是万恶之源。首先,父权制存在于从古到今的各种社会之中,无论是古代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还是当代的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其次,父权制是一种总体性的支配制度,因为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一些男人可能支配另外一些男人,但是在所有这些社会中,所有的男人都支配妇女。最后,父权制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把女性的功能界定为满足男人的欲望以及生育和抚养孩子。一方面,父权制意识形态把男人对女性的支配合法化了,另一方面,任何超出这种父权制界定的女性行为都是非法的。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对父权制给

<sup>\*</sup>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制度文明的哲学理念创新”成果(项目编号:16JJD720008);国家 2011 计划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研究成果。

予了强烈的批判，而这种批判可以从三个层面来加以分析，即“母性的分析”、“性别批判”和“女性的解放”。

### 一、母性的分析

人们通常认为，女人与母亲是自然而且必然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开。女人总是要生孩子，并且还要抚养他们。如果女人自然而且必然成为母亲，那么生育和抚养孩子就是她们的天职。但是，在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看来，这种为妇女普遍接受的观点实际上是一种父权制意识形态，服务于男人对女人的压迫。为了揭露从而消解这种父权制意识形态，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对母亲的身份或母性（motherhood）进行了深入地分析和批判。

这种分析和批判的核心是区分了生物学的母性和社会学的母性。按照生物学的母性，母亲与其子女之间存在一种生物学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做母亲”（mothering）意味着女人生育孩子和照顾他们。按照社会学的母性，母亲与其子女之间存在一种社会学的关系，在这种意义上，“做母亲”意味着建立一种抚养关系，而这种抚养关系不仅存在于母亲与其孩子之间，并且也存在于任何一个人抚养和照顾另一个人之中。（Jaggar, 1983: 256）或者换一种说法，我们可以在“母性经验”与“母性制度”之间做出区分。“母性经验”的主体是女人，她们决定谁、如何、在什么时候以及在什么地方成为一位母亲。“母性制度”的主体是男人，他们为女人做出了这些决定，并且使所有事情处于其控制之下。（Tong, 1989: 87）

按照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的观点，生物学的母性与社会学的母性不是必然联系在一起的。虽然只有女人能生育孩子，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由她们来照顾和抚养孩子。母性制度体现了一种父权制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告诉妇女，除非一个女人是一位母亲，否则她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女人，而且它还让女人相信，做母亲是她们唯一的工作，一份每天24小时的工作。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要害在于通过强调生物学的母性而掩盖了社会学的母性，用母性制度压倒了母性经验，从而维持了男人对女人的统治。

在父权制意识形态中，社会学的母性与生物学的母性以及母性制度与母性经验是混合在一起的，这样就使女人、母亲和生育都变得神秘了。用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的话说，“母性是一个神话”，而这个神话建立在父权制的三个教条之上，即“所有的女人都需要成为母亲，所有的母亲都需要她们的孩子，所有的孩子都需要他们的母亲。”（Jaggar, 1983: 256）让我们对这父权制的三个“教条”加以具体分析。

第一个教条“所有的女人都需要成为母亲”——来自于女孩的社会化以及流行的心理分析理论。通过社会化，父权制社会灌输给女孩以必须成为母亲的观念；通过心理分析理论，通俗心理学为社会化的过程提供了伪科学的支持。在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看来，如果父母不给他们的女儿买玩具娃娃，如果学校、教会和媒体不强调做母亲的神奇，如果心理治疗者、心理分析者和心理医生不是竭尽全力把“反常的”女孩（不想成为母亲的女孩）变成“正常的”女孩（想成为母亲的女孩），那么没有多少女孩长大成人后会变成这样一个女人，她为了体现自我价值而需要成为母亲。也就是说，女人是通过社会的和文化的条件作用而成为母亲的。

第二个教条“所有的母亲都需要她们的孩子”——基于这样一种观念，即除非一个女人的母性本能得到满足，否则她将会产生日益增加的挫折感。在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看

来,无论母性本能是指所有正常女人都感受到了一种想生孩子的欲望,或者还是指她们在怀孕期间有一种飞蛾扑火般的驱动,实际上都不存在这样的母性本能。通过一些具体案例的研究,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指出,母性本能是文化上构造出来的,做母亲的能力是后天习得的。简言之,母亲不是天生的,而是造就的。

第三个教条“所有的孩子都需要他们的母亲”——在母性之神话中是最有压迫性的。这个教条包含了三个关于母亲与孩子之间关系的假定:1. 孩子需要生物学的而非社会学的母亲;2. 孩子需要其母亲而非父亲的全心照顾;3. 孩子只需要一个抚养者,而非许多抚养者。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认为这三个假定都是错误的:第一,相关研究表明,对于抚养孩子,社会学的母亲与生物学的母亲是一样有效的;第二,孩子对于父亲的需要与对母亲的需要是同样的;第三,对于抚养孩子,“一对一”的模式并不一定比集体或社会的模式(如以色列人的“基布兹”)更好。

通过上述分析,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试图表明,母性不是女人的一种自然需要,而是一种文化构造,即一种出于压迫目的而编造出来的神话。这种神话向妇女灌输这样的观念:生孩子的女人是正常的,不生孩子的女人是反常的。这里的要害在于,决定“正常”与“反常”的是父权制。于是,即使女人不喜欢生孩子,但是为了避免被谴责为反常,她们也会成为母亲。用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的话说,“女人是被迫成为母亲的”(Jaggar, 1983: 256)。

如果女人成为母亲是被迫的,那么强迫女人的是父权制。按照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的分析,父权制是通过三种方式来迫使女人成为母亲的,即意识形态的、经济的和技术的。首先,根据父权制的意识形态,母性是一个女人实现自我和获得尊重的唯一方式,这样,不能生育的女人是“可怜的”,而不想生育的女人则是“幼稚的”、“没有女人味的”、“不正常的”或“自私的”。其次,在父权制社会中,经济和就业方面存在严重的性别歧视,妇女很难找到工作,或者被迫接受低薪工作。恶劣的工作条件和贫困的经济处境迫使女人不得不结婚,而生孩子就成了女人为了得到男人支持而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最后,一方面,父权制社会想方设法不让年轻女人掌握正确的避孕信息,使她们能够得到的避孕技术是不方便的、不可靠的、昂贵的和危险的。另一方面,父权制社会限制女人堕胎,甚至完全禁止堕胎,同时对女人履行其婚内或婚外的性角色而施加了巨大压力。也就是说,虽然现代科学技术为女人不想成为母亲提供了各种技术手段,但是父权制社会限制或禁止她们运用那些技术。(Jaggar, 1983: 256—257)

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非常关注生育和母亲问题,这一点在所有的女权主义派别中是极为突出的。它坚持认为,女性的敌人是父权制,而父权制的压迫集中体现在女人的生孩子和做母亲之中。虽然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为反对女人做母亲提供了大量的论证,但实际上她们之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争议,一些人反对女人做母亲,另外一些人则赞成。问题在于生育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是父权制的理由,如男人需要儿子作为继承人、助手或自我的延续,那么所有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都会坚决反对女人生孩子和做母亲。如果是出于女权主义价值而生育,那么一些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则会表示赞成。另外,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不仅批判父权制社会给女人派定的角色——生育孩子并且独自承担抚养孩子的责任,并且也要求父亲在抚养孩子方面承担同母亲一样的责任。显然,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这样的要求也是公平的,而且这些批评和要求目前在很多发达社会已经逐渐为人们(其中包括男人)所接受。

当然，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在生育和母亲方面的观点过于偏激，因为我们知道，生孩子和做母亲是具有双重性质的事情，它既可以基于坏的理由也可以基于好的理由，既带来痛苦也带来快乐，既让女人感到心身疲惫也让她们感到幸福安宁，既增加了女人的负担也体现了女人的力量。在这些双重性质中，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只盯住对妇女不好的一面。

## 二、性别批判

如果说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关心的是自由、平等和正义，而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关心的是资本主义、异化和阶级压迫，那么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对性和性别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的压迫来自于父权制，而父权制建立在性别的男女二分基础之上。虽然她们承认生物学上的性（sex）是自然的或天生的，但是认为性别（gender）是由父权制社会构造出来的。

构造性别的基础是二元论。首先是本体论上的二元论，自笛卡尔以来，西方哲学奉行心物二元论和心身二元论。其次是人际关系的二元论，西方按照“我一它”、“主体—客体”和“自我—他者”的关系来看待人们，其中男人是我、主体和自我，女人则是它、客体和他者。最后是性别二元论，人被分为男性和女性，他们分别具有不同的心理特征，其中男人的心理特征为“自信、侵略性、大胆、理性或者能够进行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和分析的能力，控制情感的能力”等等，而女人的心理特征为“温柔、稳重、谦虚、乐于助人、同情、怜悯、脆弱、依赖直觉、敏感、无私”等等。（Tong, 1989: 3）

问题不仅在于性别的二元区分以及男人和女人具有不同的性别特征，而且在于父权制社会赋予男性特征以更高的价值。比如说男人更有理性，其思维更有逻辑，而女人的思维则被认为更诉诸情感和直觉，因此男人应该成为领导者和支配者。虽然父权制乐于用生物学来解释男女不同的性别特征，但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则认为这种不同不是天生的，而是来自于社会化和文化构造。

因为这种性别特征的二元区分是父权制得以维系的基础，所以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要想颠覆父权制，必须首先打破这种性别二分。不同的女权主义者对此采取了不同的战略，其中既有比较温和的，也有非常激进的。我们可以按照对性别特征的不同态度把它们归纳为三种战略，即“融合说”、“互补说”和“善恶说”。

“融合说”是一种温和的战略。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把男女之间的冲突看作是一种比阶级或种族之间的冲突更基本的冲突，而为了消除或缓和这种冲突，应该首先消除男女之间的（由文化造成的）性别差异。为此，女权主义者甚至发明了一个词来表达自己的战略，即“雄雌同性”（androgyny）。这个合成词来自于希腊语中的“雄性”（andro）和“雌性”（gyn）。一些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主张，男人的性别特征和女人的性别特征各有其优点，如果我们把男女的不同性别特征融合在一起，使男人带有女人的特征和行为，也使女人带有男人的特征和行为，这样不仅会消解基于性别区分的性别歧视和压迫，而且人们自身也会得到更全面的发展。因为社会的性别角色教育从儿童时代就开始了，所以为了使一个人成为“雄雌同性的”，社会应该给予男孩和女孩以同样的教育，而不是向男孩灌输男性特征，向女孩灌输女性特征。

“融合说”的意图是把社会认可的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整合在一起，以消除由社会和文化造成的性别差异。但是，无论是社会所承认的男性特征或女性特征，都既有“优点”也

有“缺点”。例如“勇敢”和“傲慢”被认为属于男性特征，“温柔”和“卑从”属于女性特征，前者分别被看作各自的优点，后者则被看作各自的缺点。这样“融合说”就面临两个问题。首先是可欲性的问题。因为男女的性格特征既有优点也有缺点，所以如果在融合中包含了双方的缺点，比如说把“傲慢”和“卑从”整合在一起，那么这种融合就是不可欲的。其次是可行性的问题。某些性别特征是根本对立的，如“傲慢”和“卑从”，因此它们是无法融合在一起的，而无论这种融合是不是可欲的。“融合说”存在这些难以克服的问题，因此一些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便转向“互补说”。

“互补说”的立场位于“融合说”与“善恶说”之间。“互补说”不再试图把男人和女人的性别特征结合为一体，而是让它们相互补充。这种战略的基础是“人”的观念。人应该全面地发展自己，实现自己的所有潜能。一个人只有全面地得到了发展，才能成为真正的人。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男人需要用女性特征来补充和丰富自己，女人也同样需要男性特征的补充。虽然不同性别的人都需要对方的特征来丰富自己，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平等地看待男女特征。在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特征比男性特征更有价值。因此，这种男女特征的互补服从于对性别特征的“一种女权主义的重构”，即按照女权主义的立场来解释和评价男人的或男女双方的性格特征。在这种女权主义的重构中，男性特征的含义通常会发生变化，从而能够为女权主义所包容。(Tong, 1989: 100) 比如说，“力量”是男人的一种性别特征。在父权制社会中，“力量”是一种支配性的力量，特别是支配女人的力量，从而它的性质是恶的。但是在女权主义的解释中，“力量”也可以是一种给予性的力量，一种给予他人帮助的力量，从而它的性质是善的。在这种女权主义的重构中，女人需要这种给予性的“力量”来丰富自己。

“融合说”不加区别地看待男女双方的性别特征，并试图把两者合为一体。与其相比，“互补说”有两个不同的特征：首先，它主张女人的性别特征比男人的更有价值；其次，为了互补，它基于女权主义立场对男人的性别特征给予了重新解释。虽然“互补说”是一种基于女性立场的战略，但是这种稍微倾向于女性的战略并不能使所有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感到满意。因此一些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提出了更为激进的战略——“善恶说”。

所谓“善恶说”是指一些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所持有的这种观点，即女人的性别特征是善的，男人的性别特征是恶的。“善恶说”的观点是非常极端的，它不仅把父权制看作敌人，而且也明确把男人看作敌人。在一些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看来，“男人不仅力图压迫女人的心灵，而且他们也力图通过这样的实践来压迫女人的身体，如印度寡妇的自焚殉夫，中国女人的缠足、非洲女人的割礼、欧洲的焚烧女巫，以及西方的妇科学”。(Tong, 1989: 104)

基于这种善恶的区分以及对父权制和男人的敌视，一方面，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对男人的性别特征进行了批评，以表明它是恶的；另一方面，她们也对女人的性别特征进行了重新解释，以阐明它是善的。

一些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认为，虽然人们通常所说的男性特征是各种各样的，但是可以把它们都统归在一种心理特质下面，即“恋尸癖”(necrophilia)。具有这种心理特质的人喜欢机械事物而非有机体，热爱死亡胜过生命。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说，这种人的死亡本能压倒了生存本能。一些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以这样尖锐的词汇来形容父权制社会中的男人：“男人热爱死亡。……男人尤其热爱谋杀。……右派的男人把谋杀辩护为一种建立秩序和维

护秩序的工具，而左派的男人则把谋杀辩护为一种引发造反的工具，此后，他们便也以右派男人同样的方式来为谋杀辩护。在男性文化中，缓慢谋杀是爱欲的核心，快速谋杀是行动的核心，制度化的谋杀是历史的核心。”（Jaggar, 1983: 269）因为男性特征是恶的，甚至男人本身就是恶的，所以一些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把他们树立为敌就不足为奇了。

即使男性特征是恶的，但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女性特征本身并不就是善的。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要对女性特征进行重新解释，而只有经过了这种解释的女性特征才是善的。这种重新解释应该秉持如下一些原则。首先，男人的道德与女人的道德是对立的。对于女性特征，如果男人认为是善的，那么它们对于女人则是恶的，如果男人认为是恶的，那么它们对于女人则是善的。其次，在女人的各种性别特征中，应该对“女性”（femaleness）和“女人性”（femininity）做出区分。在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看来，“女人性”是一种男性的构造，服务于男人利用、消费和压迫女人的目的，与“女性”没有任何关系。最后，应该对“真正的”女性特征与“塑造的”女性特征做出区分。比如说，“激情”一般被看作是一种女性特征。真正的激情是爱、恨、欲望、欢乐、厌恶、悲伤、绝望、恐惧和发怒等等，而塑造的激情则是罪恶感、焦虑、压抑、敌意、悲情、愤恨、挫折感、厌倦、顺从和自我实现等。在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的解释中，只有真正的激情是善的，并应该为女人所拥有，而塑造的激情则是恶的，因此女人应拒绝它们。

一般而言，在“融合说”、“互补说”和“善恶说”三者中，最后一种更能代表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但是，这种观点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它主张女性特征是善的，男性特征是恶的，这意味着它毫无批判地接受了男女性别的二元区分，而它本来应该谴责这种性别的二元区分。其次，这种观点认为在性别的二元区分中，男人是压迫者，女人是牺牲者，然而事实是，并非所有的男人都是压迫者，也并非所有的女人都是牺牲者。最后，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把父权制当作靶子是正确的，但是把男人当作敌人则是错误的。

### 三、女性的解放

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关注的焦点是女性所受到的压迫，而这种压迫来自于父权制。她们认为，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不仅是被迫成为母亲的，而且还被迫成为男人的性工具。妇女所受到的这两种压迫具有内在的关联，被迫的母亲始于性的被压迫。

女性意味着什么？按照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父权制文化“把女性定义为满足男性快乐的性对象”。（Jaggar, 1983: 260）在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一个女性都是按照这个定义被评价的。一名妇女想寻找一份带薪工作，“性吸引力”对于通常由女性从事的工作是一种公认资格。不仅男人以“性吸引力”来评价女人，而且女人本身也关注自己对于男人的“性吸引力”，否则她就会在父权制社会中受到挫折甚至惩罚。

在把女性定义为性对象以后，男人就会寻求占有她们。他们用意识形态的、经济的、法律的甚至身体的强迫来获取对女性的性占有。表面上，女人们的性经历是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一些人是处女，一些人是妓女，一些人是已婚者，另外一些人则是被强奸者，但是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在表面的多样性之下存在着一个更基本的事实，即男人出于自己的目的控制着女人的性行为。“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相信，无论她们承认还是不承认，女人是男人的性奴隶，从而女人与男人的性关系典型地是一种强奸关系。”（Jaggar, 1983: 260—261）在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看来，女性所受到的压迫主要是性压迫。这样的性压迫有一

系列表现形式。首先是强奸。表面上，父权制意识形态谴责强奸；背地里，它则把强奸视为正常的，从而使其合法化。某些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甚至认为，“强奸是一种大众恐怖主义”（Jaggar, 1983: 262）。其次是卖淫。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卖淫体现了男性强势群体对女性弱势群体的压迫，而父权制意识形态（以及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则公开承认卖淫的合法性。最后是色情作品。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认为色情作品是男性文化的核心，它为侮辱和强奸女人提供了理论根据。用她们更鲜明的话说，“色情作品是理论，而强奸是实践”（Jaggar, 1983: 265）。因为父权制意识形态通过强奸、卖淫和色情作品来压迫妇女为其提供了合法性，所以这种对女性的压迫是制度化的。

从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的观点看，妇女所受到的压迫是“最早的、最广泛的和最深层的人类压迫形式”（Tong, 1989: 71）。从历史上说，妇女是最先受到压迫的群体，先于任何其他形式的压迫（如阶级压迫和种族压迫）。从范围来看，妇女所受到的压迫是最广泛的，存在于已知的各种社会（如奴隶制、封建制以及资本主义）中。就性质而言，妇女所受到的压迫是最深层的，它不能通过其他方面的社会变化（如消除阶级压迫或种族歧视）而得到消除。既然妇女受到了最严重、最广泛和最深层的压迫，因此需要把她们从这种压迫中解放出来。既然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关注的焦点是性压迫，因此妇女解放也与性密切相关。这种女权主义为妇女解放提出了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否定的，女人必须逃离男人控制的空间，即分离主义；另一种方式是肯定的，女人应该建立一个女性的空间，创造一种女性的文化。

我们先讨论分离主义。我们说过，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认为妇女所受到的压迫主要是性压迫。这种压迫不是（如自由主义的女权主义所认为的）性别歧视，从而不是来自于经济或就业方面的不平等；这种压迫不是（如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所认为的）阶级压迫，从而不是来自于资本主义制度；这种压迫也不是（如后现代主义的女权主义所认为的）种族压迫，从而不是来自于白人对其他有色人种的统治。简言之，在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看来，性压迫主要来自“家里”而非“外面”。

如果压迫者是男人，压迫的主要场所是家庭，压迫的主要形式是身体控制（被迫的母亲和性工具），那么妇女要得到解放，就必须摆脱男人，离开家庭，恢复自己对自己身体的控制。也就是说，女人应该把自己与男人隔离开来。只有逃离了男人控制的空间，女人才能得到解放。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把异性的婚姻制度看作是父权制的基础，因此也把它看作是性压迫之源。按照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的观点，为了从男人的压迫中解放出来，首先，妇女应该不结婚；其次，如果已经结婚了，那么她们应该离开其丈夫；最后，她们不应该同男人发生性关系。这样，妇女实际上只有一种归宿，即女同性恋。这些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者反对与男人发生任何关联“我们不要性交，我们不要结婚，我们不要生孩子，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不会做这些该死的事情。”（Jaggar, 1983: 273—274）

但是，仅仅离开男人是不够的。为了过一种解放的生活，女性还必须建立自己的空间，建立女性的文化，以维持女性的生活，满足女性的需要，解决女性所遇到的困难。从女权主义者的实践看，这样的女性空间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真正的女性共同体（community），它能够满足女性的全部需要，使她们追求一种独立于父权制的新生活。但是这种女性共同体很少，而且通常都在乡村。另外一类是女性机构（institutions），它们通常满足女性的某些特殊需要，为女性提供某种特殊的帮助。这样的机构有：女性健康中心，它提

供从堕胎到女权主义心理治疗的服务；女性教育计划，它教妇女各种知识和技巧，如汽车维护、玩纸牌、空手道和女权主义政治学等等；女性企业，其经营范围包括印刷、出版、书店、餐馆、家具搬迁等；各种女性危机服务，如紧急电话热线、反强奸小组和家庭暴力避难所等；女性文化事业，它包括创造一种从女性观点来看的世界观，并且通过新闻、广播、音乐、电影、舞蹈、诗歌、绘画、摄影、雕塑和文学等方式表达出来。(Jaggar, 1983: 276)

这些女性机构是各种各样的，但是它们都服务于女权主义的共同目的。这些机构不仅使其创建者受益，而且也使它们的顾客受益，从而也使女权主义本身受益。这些女性机构所试图达到的女权主义目的有：为女性提供服务和保护，如为受家庭暴力虐待的妇女提供避难所，为女性提供避孕和堕胎的知识和服务、为女性提供物质性的支持，如女性企业为女性提供各种就业机会，它们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也比其他企业更为便宜；创造一种女性的文化和价值观，这种文化和价值观不仅从女性的观点出发，而且也高扬女性。

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的问题在于它过于激进了。首先，分离主义对于绝大多数女人是不可能的。分离主义需要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经济独立，妇女能够依靠自己生存，另一个是同性恋，妇女愿意同其他女人生活在一起。能够满足这两个条件的只是极少数人，即中产阶级中的白人女同性恋者。其次，女性空间是十分狭小的。女性机构的存在举步维艰，难以为继，特别是女权主义者所创办的企业面临着经济困境。女性企业规模小、成本高、效率低，其产品和服务的顾客群具有很大局限性，在同父权制社会中的资本主义企业竞争时，它们显然处于下风，难以为女权主义者提供所需要的支持。最后，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它只关注性压迫和父权制。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揭露性压迫和批判父权制是正确的，但是它没有看到，父权制并不单独存在，而总是与某种政治制度（如奴隶制、封建制或资本主义制度）合为一体。例如，在封建社会中，贵族女人与农奴女人所受到的压迫是不同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中产阶级的白人女性所受到的压迫与女性工人和女性黑人是不同的。激进主义的女权主义没有看到这些差别，它的解放战略也没有考虑到这些差别，从而也不可能对大多数女性产生重大影响。

### 参 考 文 献

Jaggar, A. M. , 1983 ,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 Rowman & Allanheld.

Tong, R. , 1989 , *Feminist Thought* , Boulder , Colo. Westview Press.

(作者单位: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暨哲学社会学院 责任编辑: 孟繁红)



philosophy. In all , through his retrospection of Spinoza , Althusser confirmed the structure of Marx's historical science.

### **Making Sense of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in Virtue Epistemology**

Xu Zhu

As an important perspective in contemporary epistemology , virtue epistemology has reclaimed “understanding” as an issue of its study. Most virtue epistemologists argue that it is supposed to make an essential transition in epistemic normativity , from the deontological sense construed by rule-following acts to the conception of intellectual virtue , which means a lot for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In terms of that transition , scientific understanding can be interpreted in a virtue epistemologist's way , including contemporary debates over factivity , epistemic luck , and knowledge-how.

### ***Elenchos* and Shame**

Lin Lijua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o-called Socratic *elenchos* and the feeling of shame in Platonic dialogues. According to a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 Socrates always refutes his interlocutors in an insincere way , either by cheating or by means of irony , that's why the Socratic *elenchos* often produces a negative and unbeneficial shame among his interlocutors. This paper aims to offer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Socratic *elenchos* and shame. On the one hand , this paper tries to show that , as a friendly common exploration of truth , the Socratic *elenchos* should be basically understood as an antithesis to the so-called Sophistic *elenchos*; and on the other hand ,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Socratic *elenchos* is chiefly concerned with a positive shame , which should contribute to our exploration of truth.

### **A Critique of Radical Feminism**

Yao Dazhi

Feminism , which has many sects , has a special position in contemporary political philosophy. Viewed from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 , the most influential ones are liberal , socialist and radical feminism. Being different from the other two main sects of feminism , the core of radical feminism is its critique of patriarchy. Radical feminism's critique of patriarchy is based on three parts: first , it analyzes motherhood , smashing the myth of motherhood established by patriarchy; second , it provides a critique of gender , revealing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is constructed by social cultures; third , it calls for the liberation of women , exploring how to liberate women from patriarchy.